

研究论文
Articles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纪末到 1919 年*

Historical Research on Mandarin Development in Malaya-Singapore:
from 19th Century to 1919

徐威雄
(SER Wue Hiong)

摘要

马新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华南的不同省籍，原本口操各种方言，最后却趋同于以华语为共同母语的族群。本论文深入探讨其历史背景及演变原因，从南洋华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方言群的互动与统合、语言生态的转变、中国时局的影响、教育革新的吁求等内外因素，直到五四运动兴起的国语推广为止。探发在十九世纪末以来华人社会与族群意识重新整合的主轴下，华语之成为族群母语的历史演变过程。

关键词：马新华语、正音、国语、族群整合

Abstract

The Chinese of Malaya-Singapore were mainly from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 本论文原为 2010 年“多元社会的语言人权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吉隆坡：林连玉基金、隆雪华堂等联合主办，2010 年 12 月 11 日）。谨此向主办单位及评论人博特拉大学庄兴华博士致以谢意。

徐威雄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Email: wuehiong@yahoo.com

They originally used their own dialects but eventually adopted Mandarin as their common mother tongu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from Western cultur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alect group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ituations on languages, the influence from Chinese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 demand of education reforms, and until the rise of Guoyu during Fourth Movement period. The finding points out that the primary development of re-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contributed to Mandarin becoming the ethnic mother tongue eventually.

Keywords: Malaya-Singapore Huayu, common language, Guoyu, ethnic integration

前言

马新华人主要是十八、九世纪从中国南迁后逐渐形成的族群，这些移民来自华南不同省县，原本口操各种方言，最后却大多趋同于以华语为共同母语的族群¹。这个历史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学界曾作过局部论述，但尚未有专文分析。

马新华族何时开始推行华语，一般有三种意见，一是1917至1920年受到中国国语运动的影响，二是受到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冲击与推扩，三则以1899年林文庆推广华语作为起点²。这些观察固然没错，却各有所偏，未能解析错综复杂的历史。马新华语的产生背景，必须追溯至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移民社会结构的演变，才能探得周全。

简单地说，华族共同语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从清末“官话”到民初“国语”，可以1919年为断限；第二是国语教育的普及阶段，一直到二战前后；第三则是战后至独立时期的“华语”转变与发展。

这三个阶段，基本上是沿着官话→国语→华语的历程，深烙在近代历史的脉络里。第一阶段是移民社会的内部需求与变迁，第二阶段和中国政局和民族思潮有关，第三阶段则与马新历史进程有密切关连。官话、国语与华语，三者异名而同实，却又同中复异，在名实殊同之间，三者关系及其演进如何，又显现了什么历史意涵（诸如政局冲击、语言演变、华教转型、族群整合、身分认同、文化运动等等），这都是马新华族史的重要篇

章，值得深入挖掘。

本论文不是纯粹语言史的研究，而是以“华语”为主轴，综合考论历史上“华语”与华族社会、教育、文化等关连的研究。这里面有语言本身的发展理路，也有内在结构的演变张力，更有外在时局的牵引推力，涉及到社会、文教、政治、族群等多层面。如此复杂庞大的议题，绝非本篇所能全面处理，且所牵涉的资料也过于零散，非长期搜罗无以为功，本研究尝试做个开端，范围限定在第一阶段，即从十九世纪末到 1919 年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华语原义

1.1 传统中国文化的华语

今天我们称为“华语”的名义，并不是马新华人所独创，它早见于早期南洋华社，甚至在传统中国便存在了。我们须回顾这个名称的历史，才能明白何以今天“华语”的缘由。

文献所见“华语”相当久远，一千多年前南朝梁僧佑《佑录·安世高传》便有记载：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政后太子也。……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世高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

后来《高僧传·安清传》转录这段文字时，将“即通习华语”改为“即通习华言”，“华语”与“华言”，二词显然同义。

这条材料显示，“华语”是汉族在与外族相对时的本族语自称。这里的“华”指“华夏”，正是春秋以来便有的中国统称。“华夏”本与“四夷”相对，故华语（华言）是指华夏民族的语言。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汉人因与胡族往来频繁，或因中外文化的交流转译，“华语”用法流行起来。再举三例，以见其余，如《隋书》卷

三十二：“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又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音，变成华语。”又《旧唐书·突厥传》“登利者，华言果报也。”

以上三条资料，说明了“华语”、“华言”的语境，是在与异族相对的情况下使用的，如“华语”对“夷言”、“华语”对“彼音”等。可注意的是，这些对照者多涉中国“境外”的异族。这种用法到明清时依然如故，例如《明史·外国传》记载一条：“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以来，当令肄习。”³其以“华言”对“尔国”（指外国），寓示了中国境内与境外的族语对称。

“华语”既为族语的统一称，这个族群自然也自称或被称为“华人”，也就是“华夏族”的简称了。例如《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记载：

西羸百里至咀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

在与胡商异族的对照下，便应用了“华人”与“华语”这组概念，值得留意。从历史文献上看，“华人”与“华语”一样，亦为对照于中国境外异族的称呼，两者经常合组出现。这点非常重要，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十九世纪南洋华社引称“华语”、“华人”时的历史情境。

1.2 早期南洋社会的华语

熟悉华人史的都知道，南洋华社从早期移民社会开始，便以“华语”和“华人”来自称。如上所论，这种称呼不始于南洋，从上引《新唐书》便知，一千年前北方边境的中国人在面对外族时便已自称为“华人”和“华语”，这实在与后来南洋的命名无大差别，两者虽在时空上有天南地北之遥，彼此毫不相干，其语用与语境却无疑是一致的。

简单说，南洋各省籍的华人在跨出中国境外以后，面对着繁杂的种族以及日久相处下，很自然地援用传统习惯上的“华语”（华言）与“华

人”的统称，来划分本族与他者的身分。这个“华人”是统合不同籍贯的族群概念，而“华语”则包括各类方言的合称，两种称法同时出现在南洋史的起点上，有其历史意义。

试以最早的《叻报》作考察，1888年4月28日该报报导一位俄国科学家统计世界上的语言使用人口：“据其所言，则操华言者最众，计共四万万人；次为印度兴多实甸尼之语，计共一万万人；次为英语，亦一万万人，又次为俄语，计共七千万人……。”可见在与世界各国对质之时，中国语言便被称为“华言”。此“华语”显然包括中国境内各地方言，1891年1月15日《叻报》报导英殖民官员为办公需要而学习华语的新闻，可相发明：

……当事者（英官员）不谙华语，则传达多艰，故有学习华语，俾得以便办公者，如第一号差馆副总差惹宁，前蒙国家月给洋银十元，俾其延师，学习闽人土语，业经有日，……该差所操闽语，业已粗通……

这里的“华语”，明显指闽南语，这是当年移民以闽南人居多之故，可见华语是个统称概念。其实，不仅华人如此自称，当时外族亦习惯以“华语”（Chinese）来统括中国各类方言，例如1872年官方教育报告书里，提到槟城一所英校教授华语时说：

(Penang) The Bale Pooloo boys' school (Bale Pooloo is a district 9 miles from George Town).....In this school the Chinese is taught.⁴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文课皆方言教学，这个“Chinese”应指客语（浮罗山背以客家人为主），而非今天专有义下的华语。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称或他称，南洋地区“华语”作为别于外族语的总称，类如今天的“汉语”概念一样，底下包括了各类方言。

即有“华语”，便有“华人”了，此两者合称多见于早期南洋社会。例如《叻报》1888年5月1日记载了总督造访槟城一所天主教堂学校时，

学童用腊丁语宣读颂词，总督听毕，“以诸学童系华人为多，因操华语以答之，用示亲之之意”，可知这里的“华人”与“华语”同列，以作为区别于总督英人身分的称号了。当时诸如“西人作事，每胜于华人”（《叻报》1893.12.29）之句例，常见于书报文章，说明“华人”亦缘于与中国境外之异族的对质称号。

除了华语、华人外，其它凡与境外异族对照者，亦多冠以“华”字，例如“华文”一辞便是。1889年1月19日《叻报》社论〈义塾章程宜善为整顿说〉论道：

……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人有子弟，而送往义塾使诵华书者，多半皆因其年幼，未能即读英书，故送往义塾若干年，使稍收其放心，或亦藉此稍识一二华文……但身为则华人，当以华文为本……

试看这里“华文”、“华人”、“华书”等成套观念，其语境正是对照于“英文”、“英人”、“英书”等而来的。这点反映出南洋华社在中国境外的身分界定，它继承了传统中国对于华夷之分文化观，最终却也因此观念而与母国分道扬镳。这样的命名称谓，在南洋华人长久脱离母国且与异族杂居相濡的历程中，渐渐演化成海外中国人的族群标志与价值内涵，日后马新华人、华语、华文等用词，早在移民社会之初便已深深埋下伏笔。

第二节、华语产生的背景

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各籍纒繁，方言音有异”（《叻报》1888.4.21），其中以闽粤两语最强势。1887年，到新加坡探访的李钟钰在其游记中，说到当地华人的语言情况：

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马来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⁵

可见当时华人通用闽粤方言或英巫外语，后来的“华语”尚未出现，以致外省人初到时有如鸭子听雷，呆若木偶。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提学李瑞清奉命赴南洋考察，多年后他回忆说：

署司前十五年曾薄游南洋，至星嘉坡埠……见我国侨居习惯，语言必须通英、巫来由、广、潮、福各种，而官音乃视同格磔。
……⁶

这是十九世初最后第十一年，中国官音（即官话）在当地依然形同格磔。那时华族已大量涌进南洋了，但多为下层苦力劳工，受教育者少，各操自身方言，不会官话仍属正常。

可见迟至十九世纪末，南洋基本上还是个方言群的社会。然而上引李钟钰提到“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已为日后族群通行语的萌芽留下伏笔了。这个通行语是如何出现的？以下试从四个层面来作分析。

2.1 各籍方言的混同

中国地域广大，传统上同姓聚族而居，构成社会主干。这些宗族即自足于内，又封闭于外，聚落间多老死不相往来，很多方言能世代传承完好，多由此故。传统社会的流动人口多见于城市居民，他们或经商或出仕，因与不同省籍人往来，其交际语可能是官话，或是当地的强势语言，但这些人仅占人口少部分，对社会语言的生态影响并不大。

但自鸦片战争失利后，大清国门被迫打开，原本东南沿岸相对静态的传统社会必受冲击。不少闽粤等居民为谋生活，纷纷挺险出海，出奔南洋群岛，适时英荷各属殖民政府为开垦拓荒，大量招徕华工，于是一批批闽粤人涌向南洋，改变了东南亚的历史面貌。

十九世纪南下的华南汉人，有两点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中国人首次大规模群徙到“中国境外”的新世界，相较于历史上几次汉族的“境内”大迁徙并不相同，南洋华人不但接触了更繁杂的种族与文化，还面临了截然不同的西方强势文明，这种全新的经验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即连佛教文明传入的震撼也无法相比拟。这样的集体经验与体会，显然会促使日常生活中更突出“华人”与“华语”的身份，对于形塑民族的群我意识也会愈觉迫切了。

第二，南洋各籍贯人群虽还保留聚族而居的传统型态，但与大陆家乡不同的是，各籍贯人群的交流碰撞更加容易，也便加频繁了，这是他们在故国家乡里较少有的互动经验。麦留芳曾深入分析早期叻、甲、檳三州府华人的聚落型态，谓华人社区多为方言群各据特定街道路段而聚居，彼此间其实都比邻接踵，近在咫尺⁷。如此社会型态，方言群的往来磨合肯定更紧密，同时也更复杂。1854年，叻地发生闽粤两帮人马的火并械斗，进而乱及全岛。根据当时英人的观察报告，说到：

这些（不同籍贯的）华人直到现都是和睦相处，彼此往来交易，混杂地居住在同一条街道上。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冲突原因。可是，他们彼此间似乎突然发生了龃龉，五月五日发生了冲突，全市镇各角落即显出骚乱，终于造成了打家劫舍（的大骚乱）。⁸

由此可见，南洋华人方群交错的聚落型态，平时可相安无事，但一有细故便各援帮群大打出手。华侨社会的特质就在“帮”的结构上，此乃结合地缘、血缘与业缘的组织，帮群间彼此分合，以谋求最大的群体利益，诚如陈育崧所言：“（帮）环绕在一个大群核心的周围，许多小群发生了结集的形象，互相关系，而又互相对立；互相矛盾，而又互相协调。它们之间存在着歧视（Discrimination）的偏见，但不濒于分裂（Separation）的绝境，在分化中转向结集”⁹。正是这样时又交融时又磨擦的社会型态，为酝酿族群共通语提供了先天土壤。

换言之，以方言群为基础的帮派分合，实为日后族群与语言整合的重要背景。如果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同语言群的频密交流，必然导致各语言间的转替变化，共通交际语的需求也自然应需而生，这正是语言演变的正常规律。其实，这样的语言变化，即便在中国东南沿岸也已出现了，便何况是更为开放多元的南洋社会。1899年垦荒头家黄乃裳曾经论

及：

……且夫闽粤之地，固相联属者也，从来有互迁互徙，彼此易居。今按潮州音如漳州，嘉应之土音如汀州雷州之土音，半杂兴化（音），以其由兴化徙居也。广州一府，居于福建省垣者几二万人，本属近邻，宜联亲旧，而顾以流寓南洋群岛，与英法美葡西，及巫来由、吉宁、斋知、五印度诸异族杂处，反生彼此歧视之心，则不智孰甚？¹⁰

黄乃裳敏锐观察到闽粤各地因迁徙易居，而导致方言语音的相互影响，因而呼吁流寓在更频繁的南洋华人没有理由彼此歧视，自划小群。这个观察很有意思，说明了身处于“与英法美葡西，及巫来由、吉宁、斋知五印度诸异族杂处”的大环境里，一个华族整合观的需求与呼吁，以及各方言因混同而变化的趋势，势必比故国内陆更易应运而生了。

十九世纪南洋华人人口众多，可成为自足的语言社会，所以不会像更早来的先辈一样被消融于马来语中（后又消融于英语里）。然而这个移民社会并无法形成一个方言独霸的社会（如香港的广东话），闽南话虽然最为通行，但也非绝对优势，其它如粤、潮、客、琼等语，在不同地区各有盛行通用。虽然大部分华人多少懂得几种方言，但仍有诸多局限与不便。试举两例说明，1902年3月，新加坡华人在代理总领事吴寿珍倡导下，于同济医院召开会议商讨建立孔庙学堂事宜，当时出席会议的闽粤绅商众多，据新闻报导：

是日也，天朗气清，群贤毕至，闽粤各商，一时齐集。太守（吴寿珍）对众宣言曰：“孔庙学堂之事，前已定议。今日特请诸君共议，董事发簿题捐。”众人曰：“诺。”再由□君懋斌操粤音重述太守之究，众人拍手……

（《天南新报》1902.3.17）

此例可见，即连闽粤商贾共济一堂时，尚得请专人用粤语翻译一遍，更别说劳工阶层了。再看数年后，1906年7月，黄乃裳为宣扬革命，邀请张维

在叻地某大礼堂演说〈政治种族皆宜革命〉的课题，对象为各阶层华侨，一天讲两次。张维为河北人，面对南洋华人听众，每当演讲时，“张（维）操国语，余（黄乃裳）与丘（菽园）为译漳泉话，俾闽粤侨皆得领解”。¹¹这条资料显示，非闽粤籍者来到南洋时的语言障碍，势必由人代译为漳泉话（即闽南语），才能与南洋各界沟通。

以上两例，可概见当时情况，凡涉及整体华人事务时，便有不便之感，一个共通交际语的吁求，必然就会出现。早在1893年4月3日《叻报》便已论及此义，其社论〈论乡音宜正〉说到：

……至于作贾，尤为紧要……则正音一事，为商者所当娴习也。
……思泰西各国语音，多不相类，而西国官商，每于各国文牒，
语言互多通晓，即华人近日亦多读泰西语言文字，况生于中国，
而竟囿于一乡一邑之间，殊非有志之士矣。

此社论呼吁各籍虽以乡音为说，但在跨群交际中应以正音为准。所谓“正音”，就是指官话。文中特别强调经商者尤应如此，大概是商人的流动性最大，最常接触不同省籍之人。《叻报》这个提倡族群共通语的呼吁，比起后来林文庆与康有为的官话运动还早上十来年。

总言之，南洋华侨社会的结构大致以商、工两阶级为主¹²。一个是经商活动的倡盛，另一个则为各省籍杂处的底层劳工群。这两大特点，正是日后推行族群共通语的结构背景。

2.2 族群整合的趋势

“华人”是传统既有的族称，然而南洋各地的华人，比起故国边境的华人来说，大概更早也更能体会到这个“族群共同想象体”的身份意识。

作为族群的整体概念，“华人”内部其实方言群林立。但因与异族杂处往来的丰富经验与实际需要，十九世纪末期方言群逐渐统合为一，这是后来共通语产生的重要背景。

这里将从帮群、商会与学校三者，来考察南洋华人社会的演变趋势。

“帮”作为南洋华人的社会基础，基本以方言群为划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马地区方言群组织发展勃兴，各种帮群相互制约，更多时候则动辄对立，火水难容，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才有改变，就如吴龙云说的：“一般学者均同意，十九世纪末期，华人方言群之间的冲突已经趋缓，彼此之间的对立不如过去尖锐。”¹³若从历史大势来看，方言群冲突的趋缓，随着来的是族群整合的开始，而华人共同语的问题也就在这时期逐步浮出台面。两者的演变恰同时期，似乎不是巧合，而有相呼应的道理可说。

早在十七世纪时，马六甲便有像青云亭这样“越帮参与”（麦留芳语）的组织，1800年槟城广福宫也属此性质。十九世纪中以后，华社在会馆、公冢、祭祀、医院等的跨方言群的需求更为明显，例如叻岛同济医院、槟岛南华医院的相继出现，都是闽粤的跨群组织。新山有统合潮、闽、粤、琼、客五帮的柔佛古庙；槟城方面则有1881年由广、福两大帮共同主持的平章会馆成立，广帮下又包括潮、客等籍，可说是涵盖了槟岛各籍华人，成为华人最高机构代表了，此尤有指标意义。再看新加坡，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广、客为主的广、惠、肇三属联合成立了跨地域与方言的广惠肇碧山亭，共同管理乡团与义山等事，学者曾指出其特殊性：“在中国本土决不可能出现像碧山亭这样跨地域跨方言的社会组织。”¹⁴这说法最能点出南洋华人社会的特质，因为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并不需要面对“境外”异族，当然就没有产生跨群组织的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了。

再看商业组织方面。经商为南洋华人社会一大特色，各籍华人经商者众多，为保护整体族群的利益，1899年黄乃裳呼吁成立商会，以统筹华人商务：

……况英法美葡西诸雄邦之于商务也，精益求精，凡天涯海角，稍有利端之开，彼则如泻地水银，无孔不入，未至南洋群岛之商权全归其掌握不止。……将欲联络南洋群岛之华人为一气，使之互为关顾，相与有成，则必先联闽粤两省散处南洋之商为一商会。不时聚集，共立规制，共计利害，将彼此之势，分而不合者，急令有以合之；情涣而不聚者，急令有以聚之。而后资本薄可以集而厚，商路狭可以推而广。……商会既立，闽粤人畛域之见既撤，

芥蒂之积既融，非但同行之商业，闽与粤可联为一气；即不同行，与不同省不同府不同县不同乡之人，凡属华种者，覩面之下，便知相亲相爱，互为关顾，及可与杂处之异族相抗衡，而事业不至为所阻遏。……¹⁵

黄氏这番言论极具历史意义，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以来闽粤越帮以“联为一气”的整体意识与时代需求。这个华人族群意识正是在与“英法美葡西诸雄邦”的对质而来的。商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欧洲列强的操控与垄断。商人最重实际，没有不希望能一语通行天下，以谋取最大利益。这样的现实需求，屡被提及。上引《叻报》“则正音一事，为商者所当娴习也”（2.1节）已可说明。实则早在1891年6月6日时，《叻报》论及正音之义已说到：“故中国特设正音，所以一天下之言而通天下之地也。……今西国驻中使臣及通商各地领事，无不通中国正音者……”，由这可以看出，商业的统合必然也会带出族群共通语的要求，这种观念，正是商业活动从传统的中国范围扩大到与“西国”竞争的更大范围的背景而来。

再来看教育方面的变化。早期南洋华人继承传统私塾教育，乃属经典教育，且多以方言教学。十九世纪中期后，渐有规模较大的义学，如叻岛的萃英书院、崇文书院等。但这些义学书院，多为地缘性或血缘性组织所创办，往往供同一方语群的学童，外籍童蒙难以入学。

虽然各籍书塾都共享一个经典系统，共濡相同的价值信仰，但这种家自为俗的办学模式，进入十九世纪末华族跨群统合的形势中，已渐显不便和不合时宜了。1888年槟岛出现闽粤两帮合作办学的南华义学，以求突破方言群界线，便是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1893年叻岛颜永成创华英书院，似也未限定省籍¹⁶。但这些仅为形式与物质上的统合，闽粤学童名为同校，实则分开授课，据当时文献记载：“（南华）义学借平章会馆中，为闽义学。粤义学二，在会馆左右。”¹⁷可见闽粤义学各自独立，教育资源上没有真正整合。至于华英书院授课情形如何不得而得，但没数年就转为纯英文学校了，这或许也与欲兼纳各方言学童来授课的困难有些关系吧。

从南华与英华学堂情况来看，跨群办学背后的语文整合问题迟早要浮出台面。1890年6月27日《叻报》论及当地创办跨方言群义学的困难时

说：

……义塾之设，于前数年曾有闻之，乃至今日，此举仍觉寂如，竟未有人起而举办。尝为细想此中之大故，大抵不难于集资，而难于择地；又不难于择地，而难于联合各籍而共为之耳。……所难者则本坡各籍之人不一，而言语因之各殊。今设大义塾以教诸童，若推无我之心，广宏其量，则实有所甚难之处。盖方言土语，各有不同，……故欲合各籍之民而一之，则势有所甚难之处，故本坡义塾，屡议而未能有成之故，亦未尝不缘是而来也。

文中感慨方言隔阂之难以破除，以致无法设立一间供给所有华裔子弟的义学堂。注意这并不是《叻报》主编的个人想法，文中说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愿景，只是时机还未到来。两年后，《叻报》（1892.3.19）再论及此事，又作同样的感慨说：

……叻地以华人为多，然则本以华文为要，虽近日通商贸易，恒视西文为重，而转觉华文为轻，不知身属华人，则华文系其根砥工夫，然则又何可以不留意及之。独是叻地设立义塾一端，又有甚难之处。盖叻地五方杂处，就华人而论，虽谓可以闽粤两省概之，然即闽粤两省，而其所操土音亦有各不相通，若设义塾，势有甚难。盖若延闽师，则不能教粤童；若延粤师，亦不能教潮童也。是以义学一事，终难有成者，胥由于此。……

清楚说明创设不分籍界学堂之障碍，正在“各不相通”的方言上——“若延闽师，则不能教粤童；若延粤师，亦不能教潮童”，此正症结所在。注意文中说在“五方杂处”处境下，“就华人而论”的整体对照语境。虽然此时“终难有成”，然则即有此设想，已启思整合教学语言之先路了。看来数年后出现不分省籍用官语教学的新式学堂，早在这里就已呼之欲出了。

简单说，十九世纪中晚期以后，南洋华社因诸多内外主客观之因素，渐从帮派分立而趋向异中求同的整合方向发展。1906年设在新加坡的中华

总商会成立，1914年平章会馆规条第一条便是“凡关华人一切紧要公共利益之事”云云，正是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族群共同语也在这样的契机下应运而生。

2.3 语文演变的形势

汉语历史悠久，各方言因时空相隔久远，益形复杂。然而各方言却有共同载体，都同系于独特的汉文系统下，彼此间关系密切。安德逊曾敏锐指出，表意文字实为构成符号共同体的重要系统¹⁸，再加上方言间独特的“文白异读”传统，方言与正音的连系不易断绝，皆为官话的整合提供了文化大背景。

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汉语文进入了一个转折兑变期，这有受外来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有语文内部百年来的自然演化。先说内部演变，最大趋势便是白话文的兴起。从唐代变文话本开始，再历宋元戏剧曲子、明清章回小说，白话创作逐渐跃上文学舞台主流，将文学受众从精英士人扩大到庶民社会来。

就本论旨而言，白话文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是从文言分途重归到文言合一，也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统一的形式，使得语文更容易通行庶民社会；二是白话文基本上是北方方言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从金朝到清代七百年，北京一直做为历代的国都，其地方语言也渐成强势官话而通行全国。这个政治中心的转移深远地影响了近千年来中国语文发展的趋势。

十九世纪后白话文的通行，恰好遇上西方语文的碰撞，而这个来自外部的冲击，正好也是大量底层南洋华人与洋人相遇的时机。对照于西方语文表音系统的便利与统一，推促了南洋中文语言的统合与变革反省，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北方祖国的语文演变相为呼应，这种历史遇合是谁也预想不到的。

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冲系下，中国语文在当时人的眼中显得相形见拙，因而催生了两大结果，其一是代表国家语言统一的“国语”概念的产生，其二是欲以拼音文字来拼写汉语的萌芽。这两者其实互有关连，欲以国语统一所有方言，必须有标准官话以及通行民间的白话文体；而为使汉字更

简明易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语言，则须仿效西方简易便学的拼音字母。当然这点对马新华语的历史关系不大，且已溢出本文主题，故不必论。而第一点却和马新华语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马新的华人精英，因为天天身处外洋冲击的环境里，比起在中国的士大夫更能体悟时变。1893年4月3日《叻报》社论〈论乡音宜正〉，论正音的重要性：

……思泰西各国语音，多不相类，而西国官商，每于各国文牒，语言互多通晓，即华人近日亦多读泰西语言文字，况生于中国，而竟囿于一乡一邑之间，殊非有志之士矣。

可注意到这里提倡“正音”，正是对照于西方各国通行标准语而来的，其于西方“语言互多通晓”之叹，寓示了日后华族共通语的必然吁求。1897年2月12日《叻报》又有社论〈论中国欲人人识字必先以妇女识字为始〉，认为欲扫除中国文盲，须从养育子儿的妇女识字开始，此文还论及学习中西文字的难易之原因，说：

泰西语言与文字合，故学文易；中国语言与文字分，故学文难。又泰西之字皆从音得，祇须教以字母之音，始二三字，继四五字，以此拼合，字无不识，故少识字之功，祇有训以字义之力，而又语言与文字不甚区，别宜乎人人能知书识字也。中国则不然，字主乎形，不能类推而识，必逐字教之以义，此中已有两层工夫，而又所出话言不能即缮作文字……

这段文字以西文作对照，点指出汉字之难学，一是文言不一，二是主形不主音。观此，可知应用简易通行的语体文，此时已在南洋文人的脑海中萌芽了。

1899年3月30日，《叻报》复有社论〈中国宜推行新字说〉，比较中西语文之得失，极力推崇造切音新文字，以取代旧有象形汉字，其谓：

近者欧西日本新字迭兴，自诋本国，字音太繁，群思通变，以此

专门者不下数十家。就中土论，蔡锡勇则创传音快字，卢懋章则创切音新字，沈学则创盛世元音，王炳耀则创拼字音谱，刘陈二氏则创大同天籁，或繁或简，义各有当。……闽中林君轸存，有推行新字一疏，倘政行言听，一下廷议，集聚取长，改二千汉文之琐尾，按九万里文字而合辙，同文之盛，及身而见，岂不懿欤？

其以欧洲文字为参照对象，而指谓汉字“字音太繁”，所以“群思通变”，很能反映出当时人的想法。文中所举蔡、卢、沈、王等切音拼字的先驱都是同时之人，可见《叻报》实在紧贴中国语文变革的最新消息。切音虽旨在文字改革，用义亦为推行全国通行语。故知清末文字之变，缘于切音字母的呼求；而切音之用义，本为统一国音。试看蔡锡勇《传音快字》（1896）发明字母来拼写作为官话的北方方言，王炳耀《拼音字谱》（1897）的最终目的是要各方言统一于“北音”，卢懋章《切音新字》（1892）虽然主张以南京语音作为“各省之正音”，但也是统一语音的国语概念¹⁹。这是这些都为后来“国语”、“普通话”概念的先导了。

史上第一个创造汉文拼音的卢懋章，年轻时曾来新加坡专攻英文数年，正是南洋这样华洋杂处的“境外”经验与冲击，间接推促了中国语文变革的第一浪潮。而这个语文的变革，又倒过来影响和加速了南洋华人的语言整合。

2.4 文化失根的焦虑

最早南来的华人，因人数不多，多涵化于马来文化，后又同化于英人文化；十九世纪后南迁人数虽众多，然多为底层的文盲劳工，日久身处巫英文化环境下，难免不受影响。有土之识，未免深忧，此即为文化失根的焦虑。解决文化失根之患，首在革新教育与推广本族语文。

从文献看来，侨民社会虽有不少私塾义学，然而华人为现实计，也爱送子弟就读英学，1889年1月19日《叻报》谈到：

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但身为则华人，当以华文为本，若舍此而但求西学，是弃本

而逐末也，忘本之咎罪大焉。

此可见当时的风气，对于华文“转从其略”。两年后，《叻报》再论及此事，〈外洋宜设公塾以训华人子弟说〉（1891.7.17）对于当地华人的“夷化”现象，甚为忧心：

窃恐再阅数十百年，势必并华语而亦遗忘，坐令数十万赤子苍生，沦为被发左衽……。

可见其忧虑。社论最后建议由领事馆出面筹办公立义学，使“令华人之凡有子弟者，送入塾中，礼延名师为之课读”，虽然这些名师乃包括“各籍师儒，以训各籍人之子弟”，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方言教学做法。但既已提出涵盖各籍学童的公立学府的概念，则欲合诸籍学童于一堂，教学语的统一便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个以官音统一教学的做法，几年后却先由一位原本不懂中文的峇峇林文庆实践出来。这点看似意外，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峇峇的失根焦虑肯定比一般华人来得严重。

林文庆为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新马知名的文人学者，所倡所行引起重视和影响。他从 1895 年开始，就陆续发表改革峇峇华人的言论，其目的除了革除陋习外，便重要是呼吁峇峇回归中国文化²⁰。欲回归文化传统，不得不学习与推行族语，而他所指的民族语言，便是作为通行语的官话了。他深以华语为自豪，并认为不懂华语的海峡华人“应觉羞惭”：

……每一位不谙华语的海峡华人应觉羞惭。英语是有用的语言，是政府的语言，因此每一位海峡子女有必要对它相当熟悉。虽然华语没有这方面的利益，但有它自己的优美，况且它涵盖了我们祖先最优秀的传统。……每一位受教育的欧人在学校都读拉丁语，没有理由华人子弟在学习英语时不学华语。²¹

透过“华语”，才能回归自己的根，才能进入传统里，传承优秀的文化价值。在这里，“华语”与整个民族认同连系了起来，甚至与民族存亡连结

上关系，这正是在与英语对质下的民族皈依。虽然林氏通晓本籍母语闽南话，但他笔下的“华语”，却是官话标准语的专名，和原本包涵方言的概念已有不同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氏以“母语”来称呼华语，这应该是新马史上首次将华语视为母语的言论了。这点其实并不意外，“母语”（mother tongue）概念本源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原义为故乡/国家的语言，林氏深通西方文化，自然就引进了这样的概念。然而，林氏的母语论并不仅仅建立在民族情感和自豪感上，也进一步指出母语教育的理由：

凡教育儿童时，如果用母语开始，则其知识的启发，也就最快最自然。

由这说法可知，林氏显然有意识地在为母语（华语）的意义提出基本论述。经他数十年不断地呼吁华人必须学华语，无形中拉高了华语在南洋社会中的形象地位。

林文庆不只坐而言，更是起而行。1899年他开始在家里开设华语班（Chinese Class），并配合着孔教运动，展开南洋史上第一波的“华语运动”。华语班的学生大多为峇峇华人，每周上一次课，许多峇峇重新开始学习这种“新的语言”，并借由此而认识孔孟思想和中国文化，在峇峇圈内造成不小的震撼和影响²²。1903年林文庆又在中国领事馆的协助下，组织了华语夜班，共分成两班，一班在中国领事馆上课，别一班在华人体育协会上课，由总领事鉴定考试；1906年，他又成功召集各会馆的华人领袖，鼓动他们在各会馆开授华语班。在马新华语的推动与传播史上，林文庆多开风气之先，甚具意义。²³

林文庆提倡学习华语运动，显示了海峡华人与移民华人因寻求共同认同而开始合流，这与十九世纪末以来华人社会与文教整合的形势相应一致。此可见新马华族语言此时已走到重要转折口，林文庆在世纪最后一年首发先声，而更大规模的官话推行，还须等到次年另一波外来推力的触发了。

第三节、近代时局的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满清帝国走到最后的十一年，南洋侨民与中国关系却日益密切。此时期中国政局的任何重大变化，无不冲击到马新来。官话或国语加速融入华社的语言生态里，就在这时期奠定下来。

基本上，二十世纪初的华人社区仍是方言独尊的时代。1904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叻报》刊登招聘书记广告，应聘者的语言条件是这样的：

新嘉坡国家示谕：大英新嘉坡国家为招充书记。……其人一须能操穆拉油语（马来语），二须能操闽语或潮语，三须能操广东语或客语，方为合格。

(1904.5.4)

官方华人书记面对的是华人社会，却没有须懂官话的要求；同年5月，雪兰莪政府举行了一场聘征华人通译员的资格考试，考核项目为闽、粤、客、潮、琼及福州六种方言²⁴，也同样没有考官话。可看此时官话还未扩大为民族共通语。上举广告中所列须通晓的闽或潮、粤或客语，正代表了华民社会四个主要的方言群。

然而，这样深固的方言生态如何调整成以官话为共通语的局面？以下试从四个小节分论之。

3.1 维新思潮与官话推行

1894年甲午战争，满清被日本打败，激起朝野空前的危机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采康有为意见下国是诏，推行维新变法，全面改革旧制。教育成了变法中重要的救国方案，包括设立新式学堂、革新科举、翻译西书及奖励留学等措施，并且指示“出使各国大臣督同领事，各就寓洋华人劝办学堂”。

百日维新的余绪也波及南洋社会来。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天涯，其理念也席卷了海外华人精英，当他抵马来亚后，华社上下为之风靡，所到之处，“以爱国忠君之说，激励侨民，一时民智为开，人心鼓舞。论者

以吾侨之启蒙运动，南海之功未可磨灭也。”²⁵

启蒙首在推扩教育，康有为在新马创办或推动了多少间学校，至今都还说不清楚，但学者很肯定指出，康有为及其维新派“尤着意于教育问题，并以提倡新式学堂教育作为吸引者与筹募款项的两大口号之一；因此，许多海外华人社区的新式学校多为维新派人士所主持，……康氏确曾在星、马华文新式学校的建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²⁶。而这个新式学堂的倡导，显然依其变法理念，其中便包括了教授正音的主张。

试看早在康氏南来前一年（1899年），深受维新变法影响的林文庆、丘菽园已在中国领事馆内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²⁷，中国领事刘毓麟还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其初创时的《简明章程》，其中一条说到：

本学堂课程，书艺兼课，既授以中国文字，及圣贤义理……惟是各籍女孩不一，拟各聘能操各籍乡谈之女师训之，初时访聘未便，或竟一律教训官音。²⁸

这条章程有两个重要讯息：一是新学堂突破专收方言籍的旧制，而招收“各籍女孩”，显示出华族学校的整合趋势。二则是教学语言的统一趋势。虽然草创过渡时期，免不了要尽依各籍方言教学，实践起来并不容易，知此仅权宜之需，其终“或竟一律教训官音”。这应该是马新史上，首次将教授官音列入学校章程里，意义重大。当时担任此华文课的老师为林文庆妻子（黄乃裳长女），每周上课两次²⁹。

康有为除积极倡学外，更以孔教复兴为号召。从吉隆坡到新加坡、檳城，再在巴达维亚、望加锡、泗水等地各地，多有向应。孔教运动合文化与教育为一体，倡议建设孔庙学堂，以保种救国，盖“保种类则在于昌国运，欲昌国运则兴孔教，欲兴孔教则在于植人才，欲植人材则学堂其可缺乎？”（《天南新报》1902.3.10）。可见孔教运动乃属“全体华人的事，跨越方言和血缘的分界线”³⁰，深具历史意义。既为整合华族，必用正音。试看1900年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时，附办孔庙学堂，并有完整规章。规章谓学堂宗旨有五：一曰爱国，二曰尊教，三曰合群，四曰育才，五曰仁民。第三项“合群”与第五项“育才”下各有条目，其曰：

合群：一曰破旧习。主客之见，闽粤之分，正当痛除。凡我华人，如家之有兄弟，如身之有手足，互相扶持，互相砥砺，以保种类。

……

育才：一曰分聘教习……二曰严定功课；三曰广购图书；四曰通习正音。……

（《天南日报》1900.5.9）

由此可见，孔教学堂的宗旨，欲结各籍而联为一气（合群）。既欲联袂畛界，则必“通习正音”，两者互为表里。便何况《论语》早有言：“（孔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所雅言。”“雅言”（正音）之成为整体文化的标志，自有其历史上的渊源了。

1900年1月康有为受丘菽园协助抵星，康氏与丘氏、林文庆等意气相投，在这些星马精英积极配合与宣导下，孔教复兴运动更如火添油，全马掀起浪潮。1902年新加坡各界精英议定创设孔庙，所附学堂名曰“中西学堂”，以示兼教中西学问。其章则共有九条，其中两条规定如下：

- 一本学当初学华文之生童，宜聘通达英文、兼通官音者为教习；
- 一本学堂华文专教官音，以便联络一气。³¹

可说与巴达维雅孔庙学堂相呼应，明确规定教习（教师）必须通晓官音，而华文科目须以官音来教导，比一年前创设的华人女子学堂更为明确了。所以必得“专教官音”者，是为使各籍“联络一气”，此又与一年前（1899）黄乃裳主张创商会以“联成一气”如出一孔（参 2.2 节），反映了这时期华族意识的整合趋势。虽然，中西学堂最后并没成功办起来，但与华人女子学堂同为文献所见最早定官话为教习语的学校，具其历史意义。数年后吉隆坡尊孔学堂等的出现（下节论及），展示了孔教复兴运动的部分成果。康有为这位说着语音不准的“蓝青官话”的广东佬，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南洋华语的重要推手了。

总结言之，从 1890 年《叻报》感叹因方言歧阂而整合义学的困难开始（参 2.4 节），至 1899 年华人女子学堂方言与官音相杂教学，再到 1902

年孔庙学堂的“专教官音”、“通习官音”，前后不过十来年时间，其进展不可说不快，这十年通行语的流行反映了新旧时代的转折及社会演变的需求。

3.2 奏定章程与新式学校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影响却极深远。它在文教方面间接促生了清末的新式教育模式，这包括制定学堂章程、派使励学等做法，南洋各地侨民兴学办校受此影响，为华教史上重要一章。

1903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后，提出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统一国语的主张。显然地，将官话称着“国语”的叫法已渐渐流行起。在吴氏的影响下，张百熙、荣广、张之洞上《奏定学堂章程》，首次将“官话”明文列入师范及高等小学课程。试看其中“学务纲要”第24条规定：

各学堂皆学官音。各国言语，各国皆归一致，故西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及字样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宜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各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³²

这段文字最大的意义，在于首纳“官话”于教育体系中，以及阐述学习国文的理由。可注意的是，这种做法明显受到西方“各国言语，各国皆归一致”的影响，反映出中国转入现代国家过程中国家语言的调整痕迹。此《奏定章程》在课程设计或国文科的规定上，不但影响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展，而且也“将本区（马新）的华文教育带上新式的阶段。”³³

马新新式华文教育，维新派拓荒于前，清廷接踵于后。《奏定章程》提出仅一年，其影响马上显露出来，首间依据此章程办建的新式学校旋即产生。1904年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兼管学大臣张士弼奉清廷之命，于槟榔屿

创中华学校，标志了学堂章程在海外的落实。中华学堂的创设办法、组织规章、课程设计，莫不本于《奏定章程》。试看《中华学校改良简章》的科目列表，便有“国文”一科，以作文和读文为主，又有“国语”两个小时。可见国语国文正式成了学校里的专科，这又比孔庙中西学堂更为具体了。中华学堂亦设有夜学简易科，专收晚班学生，只授六门科目，其中两科便是国文与国语³⁴，对于国语文之重视，可想而知了。虽然开创之初，师资缺乏，授课困难，但领事馆依然设法“就地选择学问稍优，品行端正，兼通正音者十二人为教员”³⁵，强调其师资必兼通正音者，从这可看得出来，这所学堂严格执行正音教学。而这也反映了槟岛在地华人是有通习官话的。

中华的开办获得朝廷上下极度重视，次年（1905），张弼士亲护皇帝墨宝来槟，会聚槟、吡两地殷商名望于一堂，即席筹募经费十万余元，并发表演说：

……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裔之子弟；而我华裔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伏思我等华商，凡遇天下有事，筹款设赈，莫不慨然解囊相助。各地有事，尚且不分畛域，何况事出本埠学校之事，更非捐助各地赈款可比！今与同志诸君会议，务祈慷慨乐输，集腋成裘，共成善举，并将公举监督、总理、协理，及建校一切事宜，各抒所见，和衷商榷，速为订议，不胜翘盼之至。³⁶

此中言论，显示出新式学堂之新，不仅在于其课程规章之新，更在打破旧学省籍之框架，此“不分畛域”的办学理念，正是当时思潮之所趋，也正是在“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西文学堂甚多”的对比语境下而来的。欲“不分畛域”，则务必破除方言障碍，此即为新式学堂之必随着官话、国语之教学，两者互为表里，而相为因果。这正是本文所不断强调的。

中华虽非首间教习国语的学堂，却是第一所依学务章程创办的学校，并获得光绪帝御赐墨宝，产生极大效应。从北马到中马，再到叻屿各地新

式学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进一步推高华族共通语的地位。诸如应新（1905）、养正（1905）、端蒙（1906）、道南（1907）、尊孔（1907）、育才（1907）、坤成（1908）、邱氏学堂等等，都是在此风潮下成立的。以下试就其国语科作检视。

在新加坡方面，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察商务大臣杨士琦奉命出洋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他回国后禀奏说道：“新加坡……学堂四所，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³⁷这里虽没指明是那四所，但按当时状况来看，应就是最早的新式学堂应新、养正、端蒙与道南了。杨士琦说这四学堂“悉遵学部定章”，而且“宗旨纯正”，显然必和檳城中华一样，“国文”必列为其中一课了。

至于半岛上，除中华外，最早两间为尊孔与育才。尊孔创办人陆佑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可视为孔教运动的产物；此校同时又与清廷有牵连，它由视学官刘士骥牵引促成，并获驻新总领事孙士鼎资助，学制依官方规章而设。开校五年后（1912），华民护卫司向雪兰莪殖民政府报告尊孔状况，其中提到其科目：“科目以华文教学，阅读、书写、听写、体操、唱歌、国语、绘画、算术，同时也教导基础英语。”³⁸可证尊孔依学章而开授国语。

至于怡保育才学校，其创办人胡子春曾参与檳城中华学堂的创办，复于1907年在怡保创育才学校，其体制与中华、尊孔相等，乃向清廷报备立案，均属公立两等学校，一循大清新学章程。³⁹开学半年后《檳城新报》（1907.7.12）报导该校“学堂实验表”，列出学生的考试科目有“修身、经学、国文、国语、算学、习字、图画、体操、音乐九门”，国语文都是专科。此外，育才也和中华同样，附设夜学班，授课即包括了“国文”与“国语”（《檳城新报》1907.5.18）两科。同时期胡氏又在拿乞（Lahat）创乐育两等小学，此校曾于1909年刊登招生广告，其中提到该校条例：

本堂（乐育学堂）以正音教授，讲解则兼用土音，以期普及。无论各省士农工商子弟，概可就学，不分界限。

（《中兴日报》1909.12.18）

此广告说明了“正音”（官话）为乐育学校之特色，故特别强调之，然又须以“土音”（方言）为辅，这正是初期过渡现象。又谓正音教授而可“不分界限”，则与张弼氏强调“不分畛域”用心亦同，反映了当时人心所趋。

以上所例举中华、尊孔、育才、叻岛四校，皆为新式华校的始祖和侨头堡，带领马新华文教育作质量飞跃，往后的新学堂莫不受响影，说明迈入二十世纪时马新华社族群共通语的转化形势。至于另一华人聚众的印尼诸岛，情况也大致相同，上节已举证 1900 年时巴城孔庙学堂规定“通习正音”，六年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钱恂、董鸿祚等抵爪哇视学，后向两江总督端方拍电说：

爪哇学生，通晓官音，可接中学程度者约三十人，志切归国读书，选地南京，川资日用自备，惟请官给食宿。⁴⁰

可见“官音”已在爪哇渐传开来，可说是与马新同时同步，是为南洋华族通行语之新纪元。端方接到电报后，向朝廷上奏了请办中学堂以收容这些欲归读的海外学生，从而促成了暨南学堂的成立：

兹据南洋各岛视学员，学部专门司行走举人董鸿祚等，护送爪哇华侨学生二十一人到宁（南京）。查该学生等，流寓远方，不忘中土，情殷内渡，地极可嘉。查该生等初回内地，语言骤难合一，应选派教习，补习国文、国语及各项科学一年，再行考验程度，查询志愿，分送各学堂肄业。且闻内向方殷，来者日众，非为特辟一校，不足以敷教育而系侨情……筹拨经费，择度校舍，延订教习，分科教授，派员管理，统合尽一，名曰暨南学堂。⁴¹

这便是暨南大学的前身，对于南洋华人，可说意义重大。暨南学堂作为南洋学生深造的学府，为了“统合尽一”南洋各地方音，学生刚到时得先“补习国文、国语”一年。查 1907 年暨南学堂开创之初，便已设有“国文”专科，可见“国语”已成了整合各籍的族语代表。从奏文“内向方殷，来者日众”来看，当时归国入学者众，到民国时代更成了侨教的最高学府，

它对于南洋“国语”的推动，必然也起推波助澜之功。

3.3 语言整合与身分认同

对马新华语的另一波重大影响，便是“国语”概念的出现。

“国语”一辞，深深烙印着现代性的色彩，本是西方民族国家下的产物。西方文明席卷全球后，所有国家均无所逃于其间，不管愿不愿意，都不得不急起效尤，以应付强势袭来的欧美震撼。在中国，它伴随着近代白话文的整合普及趋势，成为国家转型的重要环结。

光绪三十二年（1906），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中提出“普通话”一词，至此国家语言的命名已摆上历史舞台，此命名背后寓示了统一通行语的呼求。至宣统二年（1910年），主张用拼音统一语音的资政院议员江谦等人联名提出说帖，对于立宪中的教育事项提出建言，包括了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1911年6月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至此“国语”不但渐代官话之名，还正式列入了国家宪章里⁴²。《法案》第五条明定各地设立“国语传习所”，并指定“凡各学堂之职教员不能官话者，应一律轮替入所学习，以毕业为限。各学堂学生，除酌添专授国语时刻外，其余各科亦须逐渐改用官话讲授”⁴³，开始了推行全国统一语言的时期。

一年后清亡而民国立，共和国体新缔，然而国语政策依旧，并且作实际的语文整理工作。1912年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1913年“读音统一会”召开全国会议，审定了六千多个汉字的读音，也就是“国音”，会议并议定了推行国音的办法，其中一条包括中学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学必须用国音授课⁴⁴。至此，“国语”成了国家社会重要的语文工程了。

中国以“国语”整合国家语言，迅速影响到南洋侨民社会来，加速了族语的共识与塑造。它不但革除方言群的阻阂，团结各方省民，更代表国家与民族的认同象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语”成了新式学校的必然趋势。

按新式学校的由来有三大类，一是新创设的学校，如中华、育才、尊

孔、应新等学堂，此类率多依学部章则，故其始即以官音为正；第二类是由方言群旧式义学转型过来，例如道南、养正、日新等学堂，此类亦多据新学制，教学多用正音，或保留方言。例如1909年闽帮的道南学堂与粤帮的养正学堂，在其招生广告中删去了向来所必强调的“凡我闽（粤）帮孩童”的入学条件，而开放予各籍学童入学⁴⁵。1912年霹雳金宝的闽帮乡贤创福建学堂，原为教育本籍子弟，然至1915年忽改名培元，其校刊回顾易名之缘由时说：

……至一九一五年，（福建学堂）主事者咸认不宜囿于地域之见，众议改为培元学校。⁴⁶

注意其“咸认不宜囿于地域之见”的改名理由，说明了民国前后马新华校突破方言藩篱之风，正与方言群整合的趋势一致。这种趋势，便是以“国语”为其前导与象征。第三类新式学校则是由数间方言书塾合并为新学校，其教学语也多转换成华语。例如1912年，麻坡当地乡贤为向应新时代的到来，合并了地方上以潮、闽语教学的两间私塾为中华学校（今中化学校前身），并且“课本改用新教科书，以华语教授”⁴⁷，这种由多所学堂合并的教育整合运动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总而言之，这三类新式学校之所以“新”，其中一个重点便是延续清末以来“不分畛域”（张弼士语）而采用官音的教育思潮。

“国语”比“官话”更具崇高形象，它作为团结民族的象征，甚至成了现代国民必备的教育涵养。1917年中国教育部委派黄炎培、林鼎华等人来南洋调查华侨教育状况，行历新马、苏岛与爪哇，黄氏回国后发表了《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总论南洋华教之得失，其中第六点便强调“国语”教育的重要性：

第六，关于国民教育之设施方法宜研究。一曰励行国语。有国土而未能统一其境内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家资格。有国籍而未能操其国通用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民资格。今南洋国语，不可谓无进步矣。炎培所首欲言者，荷属渐发达，而英属

尚未能一致也。苟英属各埠各校教员，于教授时特注意，各校学董于聘校长时，校长于聘教员时特注意，则一二年内虽与荷属齐亦可。……

二曰破除省界。既认国民教育为第一要旨，则同国以内即不宜有其界限之见存。然吾观各校招生，间有限于某省某籍者，叩其原因，曰为学校创自某会馆，经费集自某属故也。自吾言之，甲属立校兼收乙丙之子弟，甲不愈荣乎！因如语言不一故，则学校固当教国语也，且因语言不一而招本属子弟，因所招皆本属子弟，而土语愈盛国语愈荒，而语言愈不能统一，因果相生，永永无了，教育之本旨安在？知明达者必能见及也。⁴⁸

这段文字非常重要，可分两要点。一是象征意义，国语象征了现代国家的“国家资格”，以及现代国民的“国民资格”；二是现实需要，国语破除了向来一盘散沙的传统社会，减少因为方言隔阂而产生的误会与武斗。黄氏还提到荷属印尼的国语教育做得比英属马来亚好，可见国语整合运动并不只发生在马新，实是当时整个南洋华族的基本现象。

黄氏将国语的教授放在“国民教育”的脉络中，显然受到民国共和思想的影响，代表了推翻帝制后的新形象。1909年初，怡保中华商会邀请来自中国的萧李两人作教育演讲。萧为潮州人，李为嘉应客家人，两人均“以国语演说”。据1909年2月9日的《叻报》报导：

萧君略谓教育有三目的，一为精神教育……；二须知尊孔……；三则国民教育：凡人未受普通教育者，即无普通智识，又乌可以肩国民之重任哉？故此三事为办学之要素云云。李君略谓海外学校，须首先重视国文。夫文字为万学之根源，试观列强莫不首习自国文字可知；次则伦理修身等学……

可见当时人看重教育之塑造国民，而国语国文又是此国民教育的基本内涵，这点与黄炎培所言相合，相信也应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与清末仅将官音视作便利沟通与不分畛域的想法比较起来，这种概念又更进一步了。

至于黄炎培第二点的现实需求，实便是南洋社会帮群林立的基本写照。虽然此时已没那么严重，但黄氏此次南来调查却也亲身领教到这种方言群的彼此分界：

民国六年（1917），教育部曾派黄炎培、林鼎华二君，前往调查南侨教育，并到各地宣讲侨教之重要。当时用普通话演讲，须请一人翻译粤语，一人翻译闽语，殊觉不便，遂感国语之重要。⁴⁹

这个情况，前文已引过两个同相的例子（参2.1节），在国语已相当通行的时期尚且“殊感不便”，实可想见方言界线之不易打破。这点正是当时人最常提到的现象，本文各章节已多次论及。至此，便能容易明白何以华人族语的必然出现。

进入民国时代，因为新风气新观念的影响，学习国语成了国民必备的涵养，从而进到华人的日常生活中了。当时各类书报，莫不随时提倡，或是广为宣说，试举数例，以见当时情况。1909年2月9日《叻报》有则〈道喜误会倒屎〉的新闻笑话，报导一个广东人将外省人说的“道喜”误听成“倒屎”，引起哄堂大笑。记者在新闻后面加了按语说：

噫！中国欲言语之齐一，其惟正音乎？观地球各国，凡一国之内，言语必同，所以举国视若同胞，相亲相爱，国势由兹强盛。中国因言语不同，致有县界府界省界之分，每以小故微嫌，自伤同种。与外国较之，优劣强弱，判如霄壤，是以学部定章，学堂各学科，必兼习正音也。

可见这种因方音造成误会的“殊感不便”，更加推促了提倡国语的风气。此则新闻的隔日，《叻报》便打铁趁热，连续几天作了〈国语之价值〉专题报导（2月10至13日），其文一开头便说：“我中国人素乏团体，动生疆界之分者，其隔阂之原因，大都根于言语不通之故也。欲言语一致，其惟正音乎。是以学部新章，重视国语，通飭各初级学堂，以国语为一科也。”即以中国人的整体概念与认知来阐述国语的必要性，往下则引用许多小故事，以提醒学习国语的好处。1919年10月3日《檳城新报》有篇

〈中国人宜注意国语〉谈到：

吾国语言庞杂，至不能联络感情，虽同居一室亦视若外人。今者欲矫斯弊，故宜全国学校皆授以普通音。……虽然学界之外，收效犹为迟缓，贵能遍设夜学国语专科，以便各界工余从事学习，既不碍于营生，又能期其普及，从此国人断不致情感阂隔也。

所论的理由大致相同，并具体建议广设夜学国语专科，以便推广普通话，以融全族为一体。在这里，国语正是化“外人”为已族的整合象征，是中国在与欧美国家对照下的现代国民的产物。其题目为“宜注意”，说明了国语成了作为中国人/华人所当注意的内涵。从这里可看出，民国建立后十年，正是国语深渍于南洋侨社而成为族语的时期。

在这样的社会与教育纷围里，学说和会讲国语，成了认定是不是“华人”的重要凭据了。例如峇峇华人伍连德自小受英文教育，身分认同上是华人，也曾回中国服务。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回忆当年回中国时，所面对的语言困惑，

……至中国，所最感困难者，则不能说国语。1908年有高级官员对余称：“阁下不知言华语，安能称为华人？”余无以答。余虽能操闽、粤语，惟不能说国语。

（《光华日报》1937.7.15）

可见“国语”已与族群身分的认同结合在一起了，虽然这个时候还不是人人都能说国语的。

3.4 国语运动与白话普及

民国初年，国语挟着新国家新国民的概念浸入人心，成为国民身分的表征。在南洋社会，国语最终也从官语涵化成南方各籍共通的民族语言。

当1904年英国殖民政府刊登聘招华人书记的广告时，所列的语言条件，也仅是“一须能操穆拉油语，二须能操闽语或潮语，三须能操广东语

或客语，方为合格”（《叻报》1904.5.4），显然“华语”尚未通行，故非必备语言。然而经过维新派与新式学校的推动，1909年2月16日《叻报》出现了一则〈欲雇能操官话之佣妇〉的征聘启事：

启者：欲延一华人佣妇，教一小儿学操官话。若堪录用，自能给以公道之薪水……

黄佳章启

这则启事就像今天征聘英文补习教师一样，反映出官话已在侨社渐渐时行，其实用价值也逐步提高，否则一般家长不会花钱请人来教导子女学操官话的。从1904到1909年仅短短五年，其变化不可不谓不大，二十世纪初官话在南洋各埠的迅速传播，由此可概见。

官话传播虽然迅速，但也决非一蹴而就，即步到位的。同时也需辨明，官音国语的盛行，并不意味着方言社群的消失（即便今天许多郊乡市镇，方言群依然存在）。一直到1917年，教育部派黄炎培南来调查，仍然发现“各校招生，间限于某省某籍者，叩其原因，曰为学校创自某会馆，经费集自某属故也。”这些限招某籍学生的学校，显然仍保留传统方言教学的路子。至于那些依学部章程的新式学校，理论上以官话为正，实际上也不免杂拌方言。

但也在黄炎培南来这一年，中国掀起了“国语运动”浪潮。1917年，以蔡元培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其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国语杂志、国语教科书等工作，以展开系列的“国语统一”的文化工程。同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过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主张以白话文“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次年（1918）胡氏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指新文学宗旨是创作“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至此，“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运动开始合流，国语与白话文近同等号，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潮。到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其成员网罗了当时文学、教育、语言等知名的专家学者，大会上通过〈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将国语运动推至高潮。5月4日发生“五四运动”，于是“国语

统一”、“文学革命”又与“文化革命”运动合流，三者千丝万缕，密切异常，汇成一股强大的新文化思潮，进一步推动了以白话文为本的国语势头，影响深远。

这股从1917年到1919年的国语运动，藉着五四运动的震撼而远传南洋，适时地推高南洋各地的国语普及。五四运动冲击新马侨社，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抗议运动，进一步凝聚起华人整体族群的意识。同时，南洋工人群众开始文化醒觉，以国语为基础的白话文运动，因兼具通俗与国民性质，最适合这些教育程度本不高的底下阶层了。至此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结合，成为民族意识的重要内涵。当时文人或书报之推动白话文，不啻为推广国语；欲推广国语，则必以白话文为先。试看1919年9月25日《檳城新报》载林克谐〈欲言语统一非改编小学国文课本为白话文不为功〉长文，部析何为马新地区国语未能普及之因，就在未能彻底采用白话文之故：

吾国方言之庞杂，为各国所不可比拟者，尽人而知之矣。是国家之弱，此亦一大原因。……提倡国语，以冀收言语统一之效，所以各学校高小国民等级，皆有国语科之规定。然溯自有校以来，十数年于此，固无论其毕业，或未毕业之国民高小学生，口能操国语者有几人乎。谓余不信，可以校校或人人近而详试之，方知吾言之不谬也。噫！教之者不负其责耶？抑学之者不用心而求之耶？一言以蔽之曰：不得其法耳。果无其法以统一之耶？曰有之，以白话国文教授者是已。盖白话国文，文义浅近，其文字即言语，言语即文字，以此而施之于小学生，由国民而高小，先后七年，读之、默之、讲之、作之，卒不能将所学者而说话，吾不信也，即世人亦必不之信。夫文义既浅近矣，而所作寻常之文件，亦易达意，无必深索遍引，而耗费时间。……

这篇议论已将当时国语在马新通行的情况，以及白话文对推动国语所能起的作用，说得相当清楚了。作者很有信心，以白话文来教授国语，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正说明了两者的关系。推广白话文与提升国语普及率，两者合作一体，如影随形。这里有数百年来中国话文发展的趋势，也有南洋

侨民社会的实际需求，“华语”之所以成为华族族语，必须从这个历史脉络去探索，才能探得实。

白话文运动的重大结果，便是促进马新华校里的国语教育愈行普遍，试举数例，以窥探当时的情形。1918年1月19日《叻报》一则“参观辟智学校毕业式记”新闻，说道：

吉隆半山巴辟智学校，举行毕业式。……该埠学生多客籍，而校长训词及毕业生答词，皆操普通语，绝不用方言，亦一特色也。

在这个毕业式上，从校长到学生都操普通话，可见该校国语教学的成功。报导谓此“亦一特色也”，则说明了这在当时非普遍现象。一个月后《叻报》（1918.2.10）另一则新闻，报导新加坡南洋女子学校休业的情况：“师范生演讲教育，有国语、有闽语、有英语……闻者莫不啧啧称奇。”这里国语、闽语和英语的演说，虽不同于辟智学校的单一，也足以让人看到国语教学的概况了。

论文来到最后，就以《南洋旅行记》来作检视，也是对国语发展的阶段性总结。1919年下旬，江苏无锡的教育家侯鸿鉴为了考察南洋各地侨民学校，自资南来印、菲、马、婆等地实地访察，回国后写下《南洋旅行记》⁵⁰，成了研究南洋华教史的重要材料。这本书相当有意识地记录下所见各地华校国语课的情形，正好可用来考察五四运动后马新华校国语发展的概况。

侯鸿鉴七月从厦门出发，先到菲律宾，后至新加坡，在新共参访数十所华校，按其顺序检视：〔1〕养正学校：有“国语科，教授三四年生。练习国语问答，颇见认真，教法甚佳。国语教本，为陈教员安仁编，有字课七种”（页9）；〔2〕道南学校：有“国文专修科”（页10）；〔3〕兴亚学校：“三年级二年级合授国文”（页10）；〔4〕启发学校，其谓此校：

教员教授，一律改用普通话，此由陈校长到校后初定者，是最为该校之优点矣。

（页11）

之后便到〔5〕端蒙学校：参观“国民一年甲级国语”（页12）；〔6〕公立南华女学校，特去观看：

蔡女士授国民四年三年国文，甲组复习，乙组讲授……毛生羽丰（竞志旧生）授国民一年国文缀法。各级教授，除一年生外，尽用国语教授。

（页12）

访毕南华女校后，便去参观〔7〕南洋女学校：其“小学部国民二年级授国文，国民三二年级授国文，国民一年级授国文”（页13）；〔8〕应新学校：有“王教员授国文，国民四年三年合级。某教员授国文，国民二年级。李校长授国文，国民一年级，徐教员授国文，均注入式，略有启发处”（页14）；〔9〕崇正学校：“学生则福建人居大多数。国民用闽语教授，此亦特点”（页13）。

此外，侯氏虽有参观但未提及其教学语言的，计有：〔10〕华侨学校、〔11〕育英学校、〔12〕华侨中学、〔13〕崇文学校、〔14〕爱同学校、〔15〕崇福女学校、〔16〕鼎新学校。但必须知道的是，这七间虽未提及有无国语国文课，并不表示一定没有。例如爱同学校，其于1918年2月20日《叻报》的“爱同学校招生简章”广告，所列学科中，便有“国语”一科，可证有国语教学。还有华侨学校，创立于侯氏观访之年，为新马第一所华文中学，深受五四新思潮之影响，一开始便采国语教学了。据其校刊所记：“我们的华中，又应该是所有南洋各华文学校，能以华语教学的最早种子。”⁵¹这个论断虽可商榷（不是最早的），但可证明其始即以华语立校。

参访新加坡后，侯氏北上檳城，途经吉隆坡，参观了尊孔学校，虽没提到有无国语科，但尊孔乃依学部章程而立，肯定以官音教学（参3.2节）。檳城则是侯氏的另一拜访重点，前后也参观十多所学校，再依其顺序作考察。〔17〕华侨学校：该校“对于教授上，全用国语教授”（页29）；〔18〕中华学校：该“校旧习教科，趋重英文，今加增国文国语时间”（页31），其课程则由“黄校长教高等三年级国语，以辨明中国音韵

入手，颇见清晰。某教员教授地理，某教员教授国文，某某教员教授国民级国文，均用注入式者多。往中学……朱教员教授国三国文，注音个人覆讲，未能兼顾全体”（页 32-33）；〔19〕谢氏育材学校，对其课程写得较详：

一年二年级，用闽语教授，三年四年级，用国语教授。每日晚间七时至九时，有夜课班，另招生徒，专授国语。殷君传德字厚斋，原籍吴县，寄籍大兴，任国语教授，是晚参观殷君教授国语，学生多谢氏及商店学徒。南洋气候甚热，故午后课少，晚间授国语尤佳，将来学习国语者渐渐增加，感情自多融洽，否则闽侨以闽语教授，粤侨以粤语教授，永无统一之日。即国内国外之用一国民，彼此语言不能相通，非所以筹教育之普及也。

（页 32）

接下来是到〔20〕时中学校：谓其“高小及国三四年，均有国语，一二年无国语，此校急宜改良者”（页 33）；〔21〕碧如女校：其中“国民三年级国文，谭女士讲授……国民二年级自修国文温习”（页 33）；〔22〕同善学校：“国民二年级以上，均用普通语教授，一年级以客话讲解，以普通音读”（页 37-38）；〔23〕陈氏小学校：“陈教员授国民一二年级国文”（页 40）。

还有其它未提及教学语言的学校，计有：〔24〕钟灵学校、〔25〕毓南女学校、〔26〕新江学校、〔27〕商务学校、〔28〕新华职业学校、〔29〕吴顺清义立小学校、〔30〕林氏两等小学、〔31〕杨氏学校、〔32〕胡氏学校、〔33〕王氏学校、〔34〕女子补习学校。其实，创立于 1917 年的钟灵学校，乃属两等小学校，隶于槟城阅书报社下⁵²，据此名义及所隶属单位，则必备国语科亦可知矣。

由以上检讨可知，侯氏在新马共拜访了三十四所学校，明确记载有授国语国文科的计有十五间（新加坡八，槟城七），若加上本文所确定的四间（华侨、爱同、尊孔、钟灵），则共有十九间，占其参观学校总数五成六（55.9%）。若将这数据当作是对当时华校国语课的抽样调查，则五成六

的比率虽不很高，却也不算太低。便何况侯氏所记，仅就他亲眼所见，那些没提及的，不代表一定没有国语科（例如华侨、爱同、尊孔、钟灵四校），故比率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保守估计至少应有六成多左右。这可看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马各地华校教授国语国文的比率概况，值得参考。

从侯氏论的述来看，新马华校国语课的情况不一，有的专科全年，有的只限高年级，低年级仍用方言，有的专开夜学班授华语，也有还保留全用方言教者（新加坡崇正学校）。方法上亦是教员各自发挥，有教员还自创新方式，似也没有统一教材，这些都反映了正处适应时期的状况了。侯氏曾受邀在时中学校演讲，谈谈改进侨教的看法，其中一点就提及希望“各校注意国语教育”（页37），足见国语科还处推扩及调整阶段中。

结论

本论文考察马新华语史的第一阶段（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一九年止），也就是如何从大部分人都不会的官话演变成各籍所共通的族语。基本的结论是，“华语”作为华人的族群母语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即有南洋侨民社会结构与语言生态因素，也有来自中国时局与语言文化革命的影响；它的出现自有文化精英的提倡与努力，也有中西历史演变的趋势公意。各种背景共同汇聚成族语产生的因缘，其中发展主轴便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华人社会的重新整合与族群意识的深化。本文从华洋直面对质的冲击、方言帮群的统合、语言生态的磨合、文言合一的趋势、学校革新的呼吁、内外时局环境的牵引等背景作分析，从而探发华语所以出现的历史过程。从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一九年为止，可视为华语的奠定期。这一演变的结果，也为日后马新华族的转型与形成埋下基因，此可视为马新华语史的第一个段落。

本文以1919年为此阶段论限，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1919年以后，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影响，华语进入全面普及的阶段，各校的转型也多在三十年代完成，族语的地位真正确定下来。民国时期推动国语运

动的推手黎锦熙说，“民国八九年间，推行国语之风，远播海外。今日（四十年代）南洋侨胞国语之普及，实由于此。”⁵³可见此次国语运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南洋华语的重要影响了。

第二个更重要的理由，白话国语的普及，打破了省籍藩篱的最后一道防线，进一步融合族群与深化民族的整体概念。麦留芳曾指出这点意义：“白话文普及教育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便开始推行。星马的华人学校随后亦相应采取中国国语教学。……在冲淡方言群认同所带来的冲力必是其中主要的一面。其中比较可以想象到的一种冲力就是促使方言群之间的互通婚变得普遍。”⁵⁴这个观察极有见识，据此论之，1919以后，马新华语运动进阶入另一新阶段了。

注释

- 1 华族名义下的内部是多元歧异的，当然有非华语群者，本文所指乃就大部分华人及整体历史趋势而言。
- 2 第一种说法如 H.R. Chesseman (1955: 37)，殖民政府的教育报告书即以1920为说；第二种主张有颜清滢 (1991: 284-285) 等；第三种意见则以李元瑾为代表 (2002: 119)。
- 3 本小节所引用有关中国文献中“华语”的史料，均出自张德鑫 (1990) 以及郭熙 (2006)，不一一注明。
- 4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1872: 187).
- 5 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转引自余定邦、黄重言 (2002: 190)。
- 6 李瑞清《条陈扶植华侨学务扩充招待侨民学堂文》。转引自郑良树 (1998: 35)。
- 7 参考麦留芳《方言群的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第四章 (1985)。
- 8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 (1993: 75)。
- 9 陈育崧语《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1983: 378)。
- 10 黄乃裳《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载叶钟铃 (1995: 55-56)。
- 11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载刘子政 (1979: 119)。
- 12 颜清滢著，李恩涵译 (1982: 29)。
- 13 吴龙云 (2009: 19)。
- 14 曾玲《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载陈荣照 (1999: 243)。
- 15 黄乃裳《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 (1995: 55-61)。
- 16 颜永成所办华英学院有无专限某籍学童，当时文献都未明记，但此书院有二大特点，看来应是向各籍学童开放的。一是他以个人独资而非集资族人经费来创办

- (这在当时乃少见,此观当时领事黄遵宪在向朝廷推褒他的禀文可知,见《叻报》1893.7.3),此为非专属闽方言群的义学;二是此为首次民间创办的兼读中西的义学,这点连新加坡总督都来向他道贺,也是当时人称道他的地方(见《叻报》1893.4.7、4.15),则知此书院以兼合中西的格局,其学童似也开放予各籍学童了。
- 17 方钧《槟榔屿志略》。转引自余定邦、黄重言(2002: 201)。
 - 18 安德逊著,吴叡人译(1999: 19-20)。
 - 19 参考费锦昌(1997: 1-6)。
 - 20 有关林文庆的研究,可参考李元瑾(1990)。本节讨论林文庆的华语运动,皆参考自此专书,及李氏另一篇论文(2002),所引者不一一注明。
 - 21 李元瑾(1990: 64-65)。
 - 22 Kiong Chin Eng(1907)。
 - 23 林文庆推动华语的贡献在其首开之功与尝试提出论述,但也不宜过度夸大和神化,例如有学者说“后来,移民社会也受(林文庆)影响”云云(李元瑾2002)。诚如本文所论证,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华语运动是内外诸多因素所促成的,乃属整个族群所共业,决非一人可断然掀起。试看林氏推动华语也多有中国领事馆、维新派等的互动,可知此非一人所能据功。对于移民社会的影响,最大推动力应该还是来自维新派人士、清廷鼓动办学等因素,此见本文相关论述。
 - 24 "Chinese Interpreter's Examination Result"(1904)。
 - 25 陈育崧语,见《柳影潮声》诗序(1983: 426)。
 - 26 颜清湟(1982: 183)。
 - 27 有关新加坡华人女子学堂的创建过程,可参考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 253)。
 - 28 林文庆《重创星架坡女学堂缘起》。载汤志钧、陈祖思(1993: 299)。
 - 29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1993: 199, 253)。
 - 30 颜清湟《林文庆与东南亚早期的孔教复兴运动》。载李元瑾编《林文庆的厦大情缘》(2009: 135)。
 - 31 此中西学堂条章则见于《天南新报》,1902年3月10日。
 - 32 《叻报》全文录载《奏定学堂章程》,本段文字见于1904年5月12日《七续新定学务章程》。
 - 33 郑良树(1998: 97)。
 - 34 《中华学校改良简章》收入陈育崧《马来亚华交教育发轫史》(1983: 242-245)。
 - 35 陈育崧《马来亚华交教育发轫史》(1983: 242-246)。
 - 36 陈育崧《马来亚华交教育发轫史》(1983: 240)。
 - 37 杨士琦奏折,可见于余定邦、黄重吉(2002: 169)。
 - 38 尊孔校史编委会(2008: 26-27)。
 - 39 有关育才的创校历史,可参考麦翔《百年育才史》(2008)。又,育才创校于1907年(与尊孔同年并略早数月),而非时说的1908年,此经钟伟前《考证与辨

- 析——1907 年霹雳育才学校的开校与办理情形)。载《马来西亚华文教育》(2010), 详细考辨, 殆为定案矣。
- 40 陈育崧〈来远培材 声教南暨〉, (1983: 252)。
- 41 转引自郑良树 (1998: 84)。
- 42 在 1911 年以前, “国语”名称已在民间或官方奏文渐行起来, 从本文所征引之相关史料可证, 1911 年只是列入法定名称的开始而已。同时还须注意的是, 民初之际, “官话”、“国语”和“普通话”三名并时混用, 皆为异名同指, 可本文所征引之相关史料可知。
- 43 费锦昌 (1997: 22)。
- 44 费锦昌 (1997: 24)。
- 45 颜清滢 (1982: 318)。
- 46 郑良树、魏维贤 (1975: 100)。
- 47 郑良树、魏维贤 (1975: 18)。
- 48 黄炎培《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载《教育杂志》(1917)。
- 49 林之光、朱化雨 (1936: 48)。
- 50 侯鸿鉴 (1920?)。
- 51 郑良树、魏维贤 (1975: 268)。
- 52 陈育崧〈海演邹鲁 钟灵毓秀〉 (1983)。
- 53 中华民国教育部 (1948: 1162)。
- 54 麦留芳 (1984: 11)。

参考文献

中文

- 安德逊著, 吴韪人译 1999。《想象的共同体》。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
- 《檳城新报》(1895-1919)。
- 陈育崧语 1983。〈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载氏著《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 南洋学会。
- 方钧 2002《檳榔屿志略》。载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编》。北京: 中华书局。
- 费锦昌 1997。《中国语现代化百年纪事 1892-1995》。北京: 语文出版社。
- 侯鸿鉴 1920?。《南洋旅行记》。锡成公司。
- 黄乃裳 1979。〈绂丞七十自叙〉。载刘子政编著《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 南洋学会。
- _____ 1995。〈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载叶钟铃编《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 亚洲研究学会。
- 黄炎培 1917。〈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十一、十二号。

